

第三章

遊學海外



五四健將羅家倫傳



羅家倫在回憶段錫朋的文章中說道：「在『五四』運動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們因略負浮名，遇著過一些政治社會的引誘。可是書詒和我們一班友好，絕不為動，相約繼續求學，以充實自己，再圖報國。」政治的面相，對於段錫朋、羅家倫這些積極參與五四運動的學子來說，尤其當他們初接近的時候，無疑還是複雜、難測的。羅家倫說到「浮名」，說到「引誘」，吐露了他們可能也曾頭腦發熱而隨即歸於冷靜的過程。

傅斯年先羅、段等人一年考取山東公費，已經遠赴英國，臨行前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他對《新潮》諸同仁提出的一個共勉和期許是切實的求學，這與蔡元培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以及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脈相承。受著這樣一些影響，五四的一群優秀青年紛紛出國求學，羅家倫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留美歲月

一九二〇年秋，羅家倫獲得穆藕初獎學金的資料，前往美國留學。穆乃是上海棉業大王。一九二〇年，穆氏決定捐資五萬元，用於舉薦優秀學子赴美留學。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男生而道德能力與學問並佳，日後堪為各界之領袖者為合格，請北大校長蔡元培主事，蔣夢麟、胡適、馬寅初等輔佐之。羅家倫就在被推薦的五人之列，其餘四人是段錫朋、周炳琳、汪敬熙、康白情。此乃一時盛舉，被報刊比為晚清政府派員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出洋」。羅家倫赴美入普林斯頓大學研

1 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六七—六八頁。

究學習文學、歷史和哲學，兼及教育。

如此，總算可以暫離國內現狀的糾紛，羅氏等一千五四精英也決心養精蓄銳，潛心學術。在普林斯頓大學時候的學校生活和北大時大不相同，平靜而單純。羅家倫自述：「同學僅一百三十人，多深造之士（無女同學）；教授倒有一百人左右，多當代學者。我們一同寄宿，一同吃飯，一同談天，一同討論，一同遊戲，真是四周都是在學者包圍之中。」¹「受了這種環境的感應，精神同身體都大大的改變了狀態。多讀書，少作文，暇則談天，游泅，間或同外國小孩子玩玩，亦別有天真存在。」²他在給胡適的信中，也說到了潛心學術的信念：「絕少做文，世事如此，無可為力，只以努力學問，為憂憤之出路也。」²

一九二〇年底，蔡元培奉派到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的情況，次年五月歐洲行程結束後於六月抵達紐約。羅家倫六月一日結束了普林斯頓大學學年考試後，即往紐約迎接蔡元培，此後三周時間，全程陪同並協助安排蔡元培的行程，並將蔡的行程寫成《蔡子民先生遊美紀略——東西學術界之大提攜》，於一九二一年八月連載於北京《晨報》。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九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這引發了一場風波，羅家倫與段錫朋（段與羅同時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等人仍不失五四那種對民族權利的敏感，發現問題後立刻組織了一場保

1 羅家倫：《致張維楨函》。轉引自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臺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近代中國出版社發行所一九九六年版，第三二—三三頁。

2 《羅家倫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二二七頁。轉引自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四一頁。

衛戰，且看羅氏後來的回憶：「到了民國十年，美國政府為了主張復任太平洋上海軍的均勢，以避免與日本隨時可以發生的衝突，乃於此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八月決定召開在太平洋上與海權有關的九國會議，並定於是年十一月十一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在華盛頓揭幕。這個消息出來以後，舉世風動，有關係的國家，多數均在準備應付。只有中國的北京政府，不但毫不關心，而且其中有若干派系，拋開國家的存亡，唯私人的利益是圖。……哪知就在這一九二一年暑假的時候，美國東部的中國留學生，在康涅狄格州的霍其開斯湖邊開夏令會，正是為防止和對付這些出賣祖國、出賣靈魂的勾當。來做說客的人，暗地炫耀在若干人前，說出參加他們工作的代價。吳之椿同學（哈佛研究生）聽了大驚，事後立即將詳情告我，我又邀請幾位耿直的同志們，如段錫朋兄等，一道在我房內商量。大家莫不義憤填膺，決定非當眾揭發此項陰謀不可。於是那天下午的大會中，我首先上臺報告發現禍國陰謀的大概，再請吳之椿同學詳細說明，繼之以段錫朋同學慷慨激昂的演說，於是人心大振，士氣軒昂，自是無人敢肆鼓簧。上述的遊說者，隔日亦已難覓蹤跡。我們於是確定會名為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並以五四的口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為宗旨，即將會址遷到華盛頓辦公；更將後援會於開會期內出版刊物，不斷在華盛頓向各國代表團分送。主編英文刊物者，先後有蔣廷黻、劉崇鉉、查良釗、向哲浚、吳之椿諸同學。中文通信寄與美國、加拿大地僑報，以及寄中國上海、北京各大報者，則以我寫的急就章為較多。……這場維護國權的鬥爭，也在華盛頓會議結束後，告一段落。」¹

1 羅家倫：《壇坫風淒——憑弔蔣廷黻先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一九一—一九三頁。

在紀念段錫朋的《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中，羅家倫也回憶到這件事：「承蔡先生的特達之知，使我們得到出國留學的機會。我們是同時出國的，先赴美國，再到歐洲。書詒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兩年多，非常刻苦用功。他不從事考學位，然而在讀書研究的工作上，常有特殊的看法。他自己不寫文章，可是我們把寫作給他看，他常有深刻的批評，為我們所佩服。當我們到美國的第二年，正遇著華盛頓會議，以謀覓取太平洋和平方案，當然山東問題為其主要難題之一，這也正是我們這班從事五四運動的人的未竟之志。這時候北洋軍閥還是和南方革命力量相對峙，而北洋政府的交通系更想爭取代表，達到他們的私圖，遂先以三萬美金，收買少許留學界的敗類，為他們作工具。這件事在湖村（Lakeville）地方東美留學生年會中被我發現，經少數朋友商量後，次日在會場由我發難，當場揭布了那班敗類的罪行，推翻了他們把持的局面，另外組織了留美中國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以從事國民外交，同時監督官方代表團的行動，尤其注意北方交通系與親日派的陰謀。當時和我們一道奮鬥的同學們很多，如周炳琳、蔣廷黻、張彭春、童冠賢和現在臺北的李濟、劉崇鉉各位先生，都是很起勁的。在官方代表中同我們一致的是王亮疇先生和代表團顧問羅文榦先生。國內派來各公團代表，暗中奉國父命令前來在國外監視官方代表團的是蔣夢麟先生。我們打成一片，天天在會外商討。有幾次北京訓令指示代表團讓步或是代表中有人洩氣的時候，我們的後援會予以種種刺激，使他們有所顧忌，不敢十分搖動。有一次，我們知道一個準備讓步的消息，要取緊急防止步驟，書詒急了，臨時組織了在華盛頓的一百多學生和華僑，揭了大旗到代表團去示威。書詒在頭，忽然圓睜豹眼（其實他平時的眼睛並不大），大叱一聲，嚇得典型官僚、膽小如鼠的施肇基，連打幾個寒噤。（我想亮疇先生一定可以證明此事，因為第二天見面時，他曾表示愉快之感。）這

次在國外的外交後援運動，固然是由群策群力來進行的一件工作，可是始終其事、堅毅不拔的原動力，還繫在段書詒身上。當時書詒常和我們參加「五四」的朋友們談到：『這是「五四」運動未完的工作，我們做事要澈底。』¹

一九二二年秋，羅家倫因慕杜威及 Dean Woodbridge 兩教授之名，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是胡適的母校，本就是羅氏出國時候的第一志願。當時的哥大不僅以哲學和教育學著名，而且其所聘的歷史系若干教授都是一時人望。此時蔣廷黻正在哥大寫作博士論文，羅家倫多次和蔣談論到中國史學及研究方法問題。兩人都十分關注中國近代史研究。後來郭廷以告訴羅家倫，蔣廷黻幾次說到：「最早賞識我，勸我做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是羅志希。」說到這裡，不得不提及羅家倫在學術上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即很早就重視和關注近代史研究，並努力尋求支持以開展搜求中國近代史資料的工作。一九一八年，當羅家倫還在國內時，教育部訓令北京大學，原國史館經國務會議議決停辦，有關編纂國史事項，併入北大，由北大附設國史編纂處，以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主持，兼任處長。羅家倫就曾參與為該處搜集辛亥革命時代的印刷品。也許是從此時開始，他對於近代史和近代史料的意義就有了明確的認識和相當的重視。他出國之後，一直對歷史、歷史哲學頗用心。

1 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六七—六九頁。

遊學歐洲

一九二三年冬，羅家倫離美赴歐，前往德國。通過德文考試以後，開始在柏林大學聽哲學和歷史哲學方面的課程，也旁及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方面的課程。「二十年代許多中國留學生赴德深造，一則因為德國各大學府有濃厚而自由的學術空氣，二則在戰後馬克大幅貶值的情況下，帶外幣在德國兌換使用格外實惠。當時與傅斯年和羅家倫同在德國的有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員朱家驊，已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趙元任、俞大維，來自歐美各地的陳寅恪、徐志摩、金岳霖、段錫朋、周炳琳，以及直接留德的北大同學毛子水、姚從吾等人。如此人才濟濟，可稱一時之盛。他們多數追求新知識和名師的指導，往往並無意攻讀學位。這種『旁徵側擊，以求先博後專』的遊學方式，歷時六七年以至上十年以上的大有其人。」¹對於時人此種轉戰世界、涉獵駁雜的遊學方式，今人當覺詫異，而當時卻是羅家倫等人的普遍情況，羅家倫的情形尚算不得最突出的例子。

比如傅斯年歐遊之時，其治學之廣和博，今天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近乎不問青紅皂白的貪多務得，羅家倫曾回憶道：「就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東的官費，前往英國留學，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Spearmen）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種舉動，就得要明白當新文化運動時代那一班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於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之外，而且還想從裡面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這是孟真要治實驗心理學

1 羅久芳：《傅斯年留學時期的九封信》，臺灣，《當代》第一二七期，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

的原因。孟真為了要治實驗心理學，進而治物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他對於數學的興趣比較濃，因為他在國內的時候，就喜歡看邏輯的書，研究皮爾生的『科學規律』（Karl Pearson Grammar of Science）和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後來像金斯J. M. 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類的書，都是他很欣賞的。所以可以說，孟真深通科學方法論。當然以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興趣絕不會限於一方面。他對英國的哲學、歷史、政治、文學的書籍，不但能看，而且能體會。我想他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每本都看過，所以蕭伯納死後，他有做文章批評的資格，而且批評得很深刻。（可是孟真所瞭解的易卜生主義，最初卻是蕭介紹的。）以後到了德國，因為一方面受柏林大學裡當時兩種學術空氣的影響（一種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都是轟動一時的學說；一種是德國歷來以此著名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一方面受在柏林的朋友們如陳寅恪、俞大維各位的影響，所以他到柏林大學去既聽相對論，又聽比較語言學。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現了他自己曾經儲藏下的很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闢天地，所以他不但配談科學，而且是具備了解一般科學範圍的通才，並且更配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了。這是孟真忽而研究中國文學，忽而研究實驗心理學，忽而研究物理、數學，忽而又成為歷史語言學的權威的過程。」「還有一種，這群人的學術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幫助瞭解當時那種旁徵側擊，以求先博後專的風氣。因為當時大家除了有很強求知欲而外，還有想在學術裡求創獲的野心。不甘坐享現成，要想在浩瀚的學流之中，另有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八—七九頁。

會心，『成一家言』。這種主張裡，不無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氣雄心，亦不無可嘉之處。朋友中如陳寅恪雖自謙謂所治乃『咸同之間不古不今之學』，其實他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央亞細亞研究。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還有希臘、拉丁、梵文、巴厘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滿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參考運用的總計不下十六七種。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個人。俞大維則天才橫溢，觸手成春；他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的研究（即希臘、羅馬學術思想的典籍所謂 Classical Studies）……從歷史、法理到音樂，再從音樂到開槍放炮的彈道學，和再進而研究戰略戰術。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國大哲學家萊白尼茲（Leibniz）是不見得十分冤他的。如毛子水本來是研究數學很好的，不幸他的中國學問比他的學數更好，於是他就以數學的精神應用到中國文字考據學上去。他在德國研究科學地理，然而在柏林大學的古典學問空氣之中，又愛上了希臘文，於是他研究了去把利瑪竇所譯幾何原本改譯一遍，也許是純粹由於智識的興趣，也許其下意識中帶了一點要和這位最著名的耶穌士的最著名的譯本爭勝，這我可不一定知道了。諸如此類的情形還有，我所寫的不過是那個環境裡的空氣。孟真是好強好勝的人，這種空氣自然更刺激他博學好問的精神。孟真在這階段裡學術思想變遷的過程，我在上面已經簡略的說過。其實他涉獵的範圍尚不只此。有一天，在柏林康德街二十四號中國餐館吃晚飯，孟真夾了一個其重無比的書包來了。經我們一檢查，發現了三厚本一部的地質學。子水是不甚開玩笑的，可是這次卻很幽默的說道：『這部書是「博而寡約」，傅孟真讀他是「勞而無功」。這話當時氣得孟真直跳，可是大家都默認這個幽默中的真理。現在有人誤以為我的學問很博，其實哪有這回事。他們才是真正的淵博，我見到這些大巫，比小巫都不如呢！在民國十二年至十四年之間，不期然而然的，這些人大都集中

在柏林。如趙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諸位，也時來時去。有時候大家在晚上閑談的時候，各拈妙諦，趣語橫生。回想起來，真是人間一種至樂，可是此樂已不可再得了！」¹

羅家倫這一段記錄，非但對當時大家「旁徵側挈，以求先博後專」的風氣有非常透澈的解析，而且對其利弊都已有所省悟。在某種意義上，五四時代，「科學精神」幾乎成為某種「意識形態」的東西。羅所言「大家對於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外，而且想從那裡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這段話非常清晰地表明在他們選學的如此駁雜的內容後面，原有一以貫之的信念在，即相信可以並且必須以科學的眼光和方法重整對世界的看法，而這就是古老中國亟待變革的根本。正是在這種肩負重整中國觀念的責任和信念下，似乎帶來了一種中國幾千年來不曾有過的契機，讓新文化運動孕育這一代精英們在個人學術追求上抱持有所創獲，成一家言的野心。新文化運動的一代人無疑是得風氣之先，意氣風發，得天獨厚的一代人，學術上也的確立於一種對傳統大膽「懷疑」的精神，進而對抗，甚至「推翻」。顧頤剛回憶當年在北大聽胡適講課，瞧他略去了從遠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勝其煩的一段，只從《詩經》裡取材，稱西周為「詩人時代」，有截斷眾流的魄力。當時對他們這些人產生了無法估量的震動，而從這時候產生的震動一直對他們有著深遠的影響，顧氏後來所成之「一家言」無疑都奠基在這樣的精神之上。

另一方面，這一代人的留學生活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後來高等教育的定位和格局。因為他們回國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九—八十頁。

之後，成為各大學中最有影響力的或校長或教授。他們對西方奠基於「科學精神」之上的那種學術研究的崇信，相對於蔡元培時代的「兼容並包」已然有了相當激進的改變。本著這樣的精神，在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的設置中，基本照著符合西方「科學精神」的那些學科建制來做，但事實上，西方大學中的「兼容並包」則相對被忽略了。例如，當時他們雖然如此旁徵側擊，但諸如西方古典學這些並不十分合於「科學精神」的內容就並未真正進入視野。他們中不乏對希臘羅馬古典產生興致的人，羅家倫在巴黎時也曾有過學拉丁文，研究西方古典學術的想法，但很顯然，這不過是在盲目求「博」觀念下的一時興起，這一代學人在強烈的「科學意識形態」籠罩下，博或有之，專卻未然。某種意義上，五四一代學人與西學的近距離接觸看起來得天獨厚，但卻遠未成就對西方學術真正內在、深入、全面的了解。羅家倫自己就稱其在歐美各國學習的經過是「遊學」而非「留學」，他回憶在整個出國的四五年中，他們不曾固定在任何一間大學裡作過長達一年的停留，依照預定的計劃，他們幾乎訪遍了歐洲所有著名的學，也曾向許多大師級的學者當面請益。但是，一旦了解了這間大學的傳統與特點，而且與當地著名學人請教辯說，解決了心裡的疑團後，他們隨即又去訪問另一學府。這種遊學方式，多少也有點像「參觀」或者「觀摩」，但又是比較深入的「參觀」或「觀摩」，這對於深入鑽研某一學科的確是不夠的，但對羅家倫後來執掌大學則極為重要。

一九二五年，羅家倫轉入法國巴黎大學，仍然主修哲學和歷史。其中有一段時間赴英國牛津大學，意在搜集近代中國史料。是年五月三十日，為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鎮壓工人大罷工、打死工人顧正紅，上海學生二千餘人在租界內開展宣傳，集會講演，英國巡捕進行鎮壓，逮捕學生，激起市民更大義憤，一萬餘群眾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老閘巡捕房門前，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高呼「打倒

帝國主義」等口號，英巡捕開槍射擊，群眾死十餘人，傷無數，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此時羅家倫正在倫敦，事當五卅慘案的發生，羅家倫積極參與中國問訊部的工作。中國問訊部是當年春季成立的一個機構，英文名為 The Chinese Information Bureau，事出前工黨議員 Colonel C. L. Malone 與中國學生交遊，因歐洲所傳中國消息多由報紙的不實宣傳而來，於是設立一中國問訊部意在糾正不實信息。但也只是一個隨意的組織。五卅慘案發生後，中國問訊部起而做了相當多積極的工作。羅家倫亦有感於英國當地對此事諸多誤解，指為「排外運動」，於是參與中國問訊部的工作，將國內的抗議文電等送英國會議員參考，促其對政府提出質問。他曾接到一份由胡適、羅文幹、丁文江、顏任光四人署名的長電，對五卅慘案的內容、英軍警的罪行做了詳細說明。他於是集款印了五千份，加了一個題目叫：China's Case，分送英國朝野，產生了不小影響。六月十日，羅家倫在倫敦出席工黨抗議大會，發表演說，產生了不小反響。並應英國國會中工黨委員會邀請前往演講，講述上海、漢口、廣州等處實情。「於是滿城風雨，區區窮學生竟成倫敦要人了。」羅家倫的行動，甚至引起英國外相張伯倫囑中國代辦警告。到八月間，羅家倫的簽證到期，英國外交部不給展期，羅家倫又離英返法，繼續在巴黎大學的學習。但他仍然心繫中國問訊部的工作，十月關稅特會議召開前，他寫了一個《中國問訊部說明計劃書》，寄送給兄希齡、梁士詒、黃郛、許世英、李煜瀛等人，希望能與當局或有關方面接洽，給予中國問訊部支持。¹

在巴黎期間，羅家倫由伯希和（Paul Pelliot）提名推薦成為巴黎亞洲學會會員。

1 參見劉維開：《羅家倫先生年譜》，第四九—五二頁。

忘年之交

前面說到羅家倫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就已經頗有翻譯國外著作的興趣。他準備遠渡重洋到美國留學時，心裡也還有著編譯書稿的計劃。羅氏通過蔡元培的介紹，與商務印書館經理張元濟取得了聯繫。從張元濟當時日記中，可以看到走訪記錄。一九二一年羅家倫赴美之後，張元濟日記中留有多次與羅書札往來的記載。此後，羅家倫與張元濟一直保持著聯繫，留學中幾次遇到囊中羞澀、生計告急，多賴張元濟幫助，得渡難關。羅家倫在北大得蔡元培頗多獎掖提攜，後識得張元濟，又得其賞識和資助，晚清和民初傾向新學的這兩代人之間，又成就一段佳話。¹

張元濟同蔡元培一樣是前清翰林，張氏思想不如蔡元培「新」，但亦有意西學，銳意改革。張元濟曾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便投身文化教育事業以為救國報國之途。但時勢變遷甚巨，在張元濟經營文化事業的過程中，他已經意識到自身的弱點，認為時事變遷，他們這一輩的人腦筋陳腐，亦應歸於淘汰。因此，張元濟積極尋求補救，尤其是重視結交和應用「新人」。他和羅家倫正是新舊兩代人之間的交往。

羅家倫在一九一九年四月號的《新潮》雜誌曾發表過一篇名為《今日中國之雜誌界》的文章，那時的羅家倫正是意氣風發，對於「舊」世界一副指點江山，捨我其誰的氣勢。他這篇針對當時雜誌界的種種現象加以批評，其中就直指商務印書館的幾種雜誌。他批評《東方雜誌》是「雜亂」派的代表，「忽而工業，忽而政論，忽而農商，忽而靈學，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教育雜誌》

1 參見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在宣揚「名教中自有樂地，綱常外別無完人」的封建道德；《學生雜誌》要求學生委曲求全，「以得任用者之歡」；《婦女雜誌》則「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就像作者在《新潮》上發表的其它雄文高論一樣，這篇洋洋灑灑數千言的檄文，引起知識界的強烈反應。作為商務印書館經理的張元濟，不僅擇善而歡，歡迎批評，而且由此堅定了他改革的決心和信心。當然，文章作者羅家倫的名字，也深深印入了這位戊戌老人的腦海之中。」¹

事實上，當時商務的雜誌也正面臨嚴重的困難，張元濟為之憂心不已。「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他的館事日記有這樣一段記載：『昨與夢（高夢旦）、仙（王仙華）談，擬將《東方雜誌》大減。……今日北京大學又辦有《新潮》一種，夢又言減價事，又應斟酌。』《東方雜誌》此時銷路越來越差，只能靠『大減價』來推銷，其窘狀由此可見一斑。《新潮》創刊一九一九年一月，這時張元濟見到的大約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發表於《北京大學日刊》上的『新潮雜誌社啟事』。該文稱『《新潮》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張元濟已預感其受歡迎程度會遠遠超過《東方雜誌》；羅家倫的文章發表後，他進一步意識到要靠減價推銷的辦法與新文化雜誌競爭是不行的，出路只有改革自己的刊物，關鍵則是人才。於是，力邀胡適來商務主持編譯所，成為張元濟改革計劃的重要一環。同時，陸續起用胡愈之、沈雁冰、楊賢江、章錫琛、李石岑等青年編輯，替代日趨保守的老人。《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婦女雜誌》於一九二一年起都不同程度地革新了編輯方向，改進了內容，其中《小說月報》

1 柳和誠：《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的全面改革尤為令人矚目。這一切，與羅家倫文章的『刺激』不無關係。」¹

正是有這樣一些鋪墊，待到羅家倫出國之前，便由蔡元培引見和張元濟定下在外編譯書稿事宜。羅出國後靠穆藕初獎學金度過了幾年，後因國內棉業衰敗，穆氏獎學金斷絕，羅家倫生活頗為困頓。一九二三年，國內學術界發生了一場「科學與玄學」的爭論，此時正是羅家倫醉心於哲學研究的高潮，這個爭論也觸發了羅家倫的興致，最後寫成為一本書，就叫《科學與玄學》。羅家倫將《科學與玄學》一書的書稿寄商務印書館，預支了幾百元稿酬，暫時維持了一段生活。當時國內雖然也有人提出接濟款項，但羅家倫總因為怕有政治及其他複雜關係，寧願窮，而不受。實在不行的時候，便向老師蔣夢麟及幾位知交告急。當時他們這些留學的知交間總是拆東家補西家，以解燃眉之急。「此時也在德充任『老學生』，研究民俗學的蔡元培，正應張元濟之託給張的女兒說媒，對象之一即是羅家倫。張本來就十分賞識羅的才華，於是準備請羅擔任商務編輯，並轉託老友打聽羅的家世等情況，表示願意資助留學川資。蔡元培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致張信說：『羅君已有復函，其家世似無問題，惟所稱『願於定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誼』云云，於尊府方面是否相宜，尚希斟酌。資助川資一層，彼尚有留英、留法計劃，需借千五百元，而以兩譯稿相抵。吾哥能玉成之否？原函奉覽。弟此時尚未告以助款之舉出吾哥美意，故彼頗以政黨為言。』四月二日張復函蔡，說：『前函擬為羅君籌借回國川資，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擔編譯之事，同時藉以考察其性情行為。今羅君歸國有期，欲赴英法再加數月之研究，鄙意亦甚贊成。茲特尊照前商，先匯去八百元。』蔡元培後來說媒

1 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並未成功，羅家倫沒有成為張元濟的女婿，但張資助羅完成學業的承諾未改。」¹

羅家倫收到張元濟這筆匯款後，內心非常感激。於是在倫敦給張元濟寫了一封長達二十三頁，近五千字的長信。他尊稱張元濟為「純潔的長輩」，其率真、自剖之情溢於言表。除了感謝張的恩遇外，信中還有一部分非常詳細地傾訴他自己在國外的感受和下一步學習研究的計劃。其謂：「今作此書與先生，不僅為致謝，乃使先生知此款所援助者何事，不才對此事之計劃如何，且略述頻年求學上態度之變遷也。」²這封信對於了解和理解羅家倫歐遊期間的生活和思想非常重要。柳和城在《張元濟與羅家倫》一文中說：羅家倫在此信中還寫道，「『世間只有兩種人是我真佩服的：一種是真有偉大魄力、人格、才幹去做事的人，一種是對於學問真有獨出心裁的貢獻的人。就過去的事實論，自外人觀之，不才似遊移於做事求學二者之間。二者自知不能兼，故不能不擇一。五年以來，均致力於後者。』經過『自省』，他認為自己『天性與為學較近』，『做事不免犧牲我率真的天地』。他告訴張元濟，出國後所治之學範圍頗廣，後來才逐漸專致力於歷史哲學。他認為，『嘗思欲導中國民族於進化之正軌，歷史哲學實為重要。』他有心寫一部中國近百年通史，『因此期為中國歷史變遷最大之期。可以斷代，兩種文明接觸後，不但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民族生存問題所關），互相衝突，而且思想文化無一而不持戰。此等大變，亦世界史所少有，乃最值得研究之問題。』」³羅家倫還提出了明確的研究計劃：

1 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2 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3 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一、來英純為大英博物圖書館，不看在中國可看到之書，或能買回中國看之書，專看其文件，國會辯論草稿等材料；三個月後赴法，亦如此辦法。

二、設法運動一宗款項，將歐洲文字發表的各種書籍，如能買得者，盡力收買，在中國建設一西文書籍之書藏。

三、此事當藉諸人協力研究，故不能不設法培養一班學生，故頗思於庚子賠款中得相當經費，設一規模不大而切實之研究，如果不成，當與國內大學中歷史學系商之。

四、編輯一種「近百年史料叢刊」。一方面就各人分開問題研究之報告刊行之，如「乾、嘉間吏治蠹敗情形」、「太平軍起事之原因」、「鴉片戰爭起源」等；一方面編輯可靠難得之近百年史料刊行之。後者又可分幾部分：（一）西洋文件，如（甲）官方為一類（藍皮、白皮書及會議記錄等）。

（乙）私人當局者之個人記載為一類（如最近瓦打西自傳等書發表，於庚子事可參考者實多）。（丙）教會記錄及關於中國文化評論者為一類。此種材料大都須抄錄及翻譯。（二）中國方面之材料，如

（甲）當年總理衙門之檔案為一類；（乙）私人當局者之記載如曾、李、耆英等之函件著述，與政治外交有關者，編訂成為一類；（如李秀成供詞尚存曾家，曾、李家定有許多有關函件可尋；至於最近商務印行之翁叔平日記、李越縵日記，其中多可批檢，為最好史料。）（丙）私人普通著述有關時事者為一類。包括西洋官方文件、個人記載，以及中國當年總理衙門檔案與私人當局者的記錄。羅以為有此史料叢刊為基礎，『方可寫一信史』，即使動手者自己寫不成史，而後人得此一層可靠

之工作，即能以此為根據而繼續建設名著也。¹

這個計劃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內容，羅家倫在英、法期間，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巴黎國家圖書館和東方學院看過不少關於太平天國的文獻，也手抄了很多，後來帶回國內。他也曾通過友人介紹，到法國外交部去看有關中國問題的檔案。他也曾通過友人介紹，到法國外交部去看有關中國問題的檔案。至於說運動一宗款項，盡力收購各種書籍，「在中國建設一西文書籍之書藏」。一九二六年，原來就讀於柏林大學的好友陳寅恪受聘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通稱「國學研究所」）導師，陳寅恪擬請擬款數千元，託羅家倫代為在歐購買及抄印有關中國史料。羅家倫還為此計劃將回國之期後延。未曾想卻接到趙元任來信，說因為清華內部風潮，此項搜求計劃一時無著。令羅家倫大失所望。

羅家倫在給張元濟的信中還提到他計劃編輯一種「中國近百年史料叢刊」，一方面對各專題研究分別刊行；一方面編輯刊行近百年可靠難得的史料。後一類包括西人官方文件、個人記載，以及中國當年總理衙門檔案與私人當局者的記錄。他認為有此史料叢刊為基礎，方可寫一信史。即便動手者自己寫不成史，而後人有此可靠材料作基礎，才能有出色的研究。羅家倫並說：「不才於此史並不欲其速成，勉力不間斷為之，當期以二十年以後耳。」「但此書如成，或有以下幾種可能。如無一於是，寧可令其不成也。」「一、為中國第一部科學的歷史」，「二、使中國人從事實裡知道自己所處的是一個什麼世界」，「三、助中國國語文立於相當的標準上」，「不才於此種工作，仍不敢

1 參見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自以為配做，但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終不能至，心嚮往之」。¹羅家倫當日計劃時，也許鑑於計劃的龐大，也許鑑於其他的原因，他對自己是否能完成此計劃留有餘地。但不管怎樣，羅家倫對近代史的及早重視，他為編輯中國近百年信史所作的努力和構想，的確意義深遠。

羅家倫這封書信的價值，也在於其中體現了羅氏不凡的眼界和抱負。仔細分析這封信，再聯繫羅一生的事業成就，也可以加深對羅家倫的了解。就信中所述，羅在歐美遊學的歲月中，對自己的人生追求有過深思和抉擇。歷經北大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兩個性質有別而都意義深遠的事件，對羅家倫來說，學術和政治成為他可選擇而又必須從中作出抉擇。而這個選擇，需要對自身氣質、性質和素質、能力有清楚的認識，方能作出。而羅家倫思考得出的結論是自己「天性與為學較近」，「做事不免犧牲我率真的天地」。想來那個時候，此言不虛，羅家倫不是沒想過政治對個人性情的犧牲和限制，但他認為自己「天性與為學較近」，這同他後來一生的事業追求相對照，則不免抵牾。只能說在他周圍頗親近的師友，諸如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影響下，他的意識層面始終傾向於「為學」，試圖保持同政治的距離。但根本上，就「天性」而言，羅家倫恐怕還是「事功」型的人。且不說回國之後，那或許可歸為「時勢迫人」，就在歐美遊學過程中，他雖屢屢在言談中表白要如何如何收心斂性、盡心學術，但很明顯的，他一刻也不曾遠離過政治，一旦遭逢事端，他即有非常靈敏、積極的反應和行動，大概這才是他「天性」中最根本的東西吧。不過，看其信中所言，他當時對學術亦非泛泛，而確有過勤學篤思。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他對自己終身的學術領地和抱負有過

1 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非常深遠的設想，雖然這些宏偉抱負沒有實現，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他所抱定的這些信念在他後來的事業中發生了作用。

張元濟從戊戌維新開始就主張培養人才。從事出版事業後，他一面通過自己的出版物以期達到普及教育的目的，一面廣泛羅致人才，充實到商務印書館各部門。對於羅家倫研究史學的計劃，他十分讚賞，一心扶植，不久又續匯七百元到倫敦，以支持羅家倫在英國的留學計劃。

羅家倫在英、法各大圖書館閱讀了大量重要文件書籍，涉及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及太平天國等各方面史料。其中有被侵略軍搶去的太平天國南京所刻書籍二十餘種，以及太平天國諸王、李鴻章、戈登等來往信件。他還參與整理巴黎東方學院所藏當年被法軍擄去的兩廣總督衙門數百箱外交文件。他託友人到各地圖書館抄錄有關中國的文書檔案，也頗有所獲。

羅遊學英、法期間一直同張元濟保持著聯繫。「在張元濟的遺物中有兩份羅在英國國會及工業抗議集會上的英文演說詞，就是羅家倫寄回供商務《英文雜誌》發表所用的。他雖一再宣稱爭取多讀國外資料，幾乎不讀國內新出的書；然而當他在一位法國漢學家那裡看到商務印書館剛剛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記》（張元濟題簽並撰跋），就情不自禁地讀了起來，並在一封致張元濟的信中對此稱讚不已。留學期間，羅家倫還翻譯了芮恩施著《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Paul Reinsc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一九二二年初版，一九二五年三版）和柏雷著《思想自由史》（J. D. Bury: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一九二七年初版）。在致張元濟的信中提到擬譯羅素近著《論教育》，後因故未譯出。」¹

1 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

一九二六年，羅家倫急於回國，卻苦於川資無著，多方求告，但當日大家均告乏絕，有心無力。羅家倫不得已寫信向張元濟告急。而張元濟接函後慨然允諾，又電滙一萬九千八百三四·七法郎至巴黎，解決了羅回國所需川資。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日，羅家倫終於得以從馬賽搭船歸國。行前，並將在歐洲收集的史料和書籍千餘冊裝箱運回中國。至七月二十三日抵達上海。羅家倫「在上海停留的一個多月中，曾多次拜訪張元濟，商談帶回的一批近代史資料編目及出版事宜。八月三日，張致函羅，談的就是此事：『疊次晤談，至為快慰，承假閱鴉片戰役文牘，連日料檢，已編成目錄三分之二，容再呈閱，原件蠹損甚重，裝裱甚費時日。鄙意擬先借錄一分，倘蒙允諾，當屬官注意勿使加損，發抄時點件收發，當不至誤，並擬選錄數件登入《東方雜誌》。謹候示。遵至尊意，擬全部印行，固足供學者之參考。然恐銷路無多，擬俟彙錄完畢，分別編次，再行奉商。又，巴黎舊書店搜得已經絕版之康雍之際寓華傳教士通信若干冊，擬屬東方圖書館備款購存，即託敝公司與巴黎素有往來之銀行代為付款。八月十八日張元濟又致函羅：『鴉片戰役分交文牘屬檢還，有葡萄牙甘結一包，茲已檢出，兩包送還。又附還太平天國官書，計抄本四冊，又零件兩種，統乞查收，示復為幸。分交文牘裱裝亦已估價，原信並紙樣送去，並祈察核。』這些史料，當時似未及出版，《東方雜誌》也未能『選錄』，其原因不詳。至於巴黎舊書店寓華傳教士通信若干冊，後來是否購到，現已無法查考了。但是，張、羅兩人為近代史珍貴史料回歸祖國和傳世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至今令人敬佩不已。』

1 柳和城：《張元濟與羅家倫》，臺灣，《中外雜誌》。